

《大壮室笔记》堂室格局研究的重要意义及近期探索*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Hall/Room Patterns in
Dazhuangshi Biji

王 晖 郑 玥 叶佳成

WANG Hui, ZHENG Yue, YE Jiacheng

摘 要: 刘敦桢先生《大壮室笔记》等系列论文所论述的周制“前堂后室”格局的延续性问题，是隐含在建筑史中的一条内在线索，对研究礼制影响下建筑形态的演化有重要意义。结合相关史书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成果进行延伸考察，笔者推断堂室格局及其功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走向分化，出现了“前后殿、东西堂”的组合形制，而在主殿（前殿）内部及士大夫住居的“厅事”等礼仪空间中仍见维持旧制。

关键词: 大壮室笔记；堂室格局；功能分化；魏晋南北朝

Abstract: In his *Dazhuangshi biji*, Liu Dunzhen identifies the continuity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front main hall with rear bedroom” (*qiantang houshi*) as a key criterion for and clue to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This continuity is significant for the study of architectural transformation stimulated by etiquette, social customs, and rituals.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rec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division of hall and room spaces/func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ix Dynasties. Although the new composition of “front and rear palatial halls with less eminent halls on both sides” (*qianhou dian, dongxi tang*) emerged at that time,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still continued to have appeal for ritual spaces, for example the front hall in the palace or in the houses of scholar-officials.

Keywords: *Dazhuangshi biji*; hall/room patterns; separation of functions; Six Dynasties' period

【文章编号】2096-9368 (2021) 01-0030-07

【中图分类号】TU-09

【文献标识码】A

【修改日期】2020-12-14

【作者简介】

王晖，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建筑设计研究。

郑玥，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叶佳成，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建筑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

*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LY20E08001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大壮室笔记》是著名建筑史家刘敦桢先生 1932 年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3 卷第 3 期及第 4 期发表的研究论文，后经作者修改，收录于《刘敦桢全集》（第一卷）。文章以深厚的文献功底考证了汉代宅第、官署、道路、宫殿、陵寝以及建筑技术细部等，其立意之高远、发微之精深殆为后人所不及。此文与其后讨论宫殿格局演变的《六朝时期的东西堂》等论文之间有一定的承接关系，纵向贯通古代宫室制度，横向延及东亚邻国建筑，蕴含了深刻的学术思想，也为后人提示了宝贵的研究思路。本文从“堂室格局”即建筑内部厅堂与居室的空间关系的角度，回顾《大壮室笔记》的重要学术意义，并汇报在此方面的近期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1 《大壮室笔记》所述两汉宅第与宫殿的内部格局

在《大壮室笔记》第一节“两汉第宅杂观”中，刘敦桢先生首先指出历代学者依据《仪礼》对周制的考证，“唯大夫士门寝规制，诸家所说，独少抵触，……此其故殆因《仪礼》一经，详于士礼，而高堂生传十七篇，出处最明，其后古文间出，亦能合若符节。”并进一步指出两汉公卿宅第对周制的继承：“终汉之世，亦循旧法，故两汉堂室犹存周制，乃事所应有。……至郑司农注礼，取证实物，今读注疏，往往见其踪迹。则东汉末期建筑，犹未尽变旧法，亦足推知一二。”^{[1]129-131}

继而循引《汉书》《后汉书》等典籍，剖析了两汉堂室的空间布局：堂有东西阶，一字之下中间为堂，两侧有东西厢，后有室，室有东户西牖，“悉与礼经合”。文中引用了清代张惠言（皋文）所绘“郑氏大夫士东房西室图”（图 1 左），此图反映了汉代经学家郑玄推断的周制格局。清代

江永、张惠言等人考证后认为大夫士也有右房（西房），并绘制了“大夫士房室图”（图 1 右），现代学者一般认同张惠言等的复原^[2]，刘敦桢先生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也援引了后者^{[3]10}。根据《仪礼》的记载，堂为待客、宴饮和举行重要仪式的空间；堂后方的室为正式的寝卧空间，也有部分仪式在室内举行；室左右为房，东房（左房）为放置食品及衣物的场所，也是更衣之处；东房北面的北堂是盥洗餐具所在；西房（右房）较少提及，其功能不甚明确；堂左右两侧有独立墙体，称为“序”，席坐时主人一方背靠东序，客人一方背靠西序，均以北为上位；由序隔出的左右外侧空间，其后部为东夹、西夹，前部为东堂、西堂（也称为东厢、西厢），均为陈设饌食及仆从侍立的空间。这些空间均包含于同一幢建筑之内，其中堂与室的前后邻接关系以及东西阶、东西序的存在，是古制“前堂后室”的标志性特征。

在文章后半“汉长安城与未央宫”一节，论及未央宫前殿（正殿），据《汉书》等记载同样有东西阶，殿内有东西厢、有房有室，“俱如古制”。其中东西厢流传最久，直到隋初犹存。“唐、宋以降，厢夹之名，闕然无闻，然东瀛古代之殿，亦有东、西厢之称。此或南北朝及隋、唐之际，自新罗、高句丽流传异域者。至于清太和殿之东西夹室，即汉夹室之廊，其为追仿旧法，又无疑也。”^{[1]152}

《大壮室笔记》辨明了汉代公卿宅第及宫殿大体维持周制的事实，在其后《东西堂史料》《六朝时期的东西堂》等论文中，刘敦桢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宫殿建筑进行了探究，以求通会中古时期的宫室演变。曹魏首创东西堂制度，其后 300 余年间南朝、北朝多有沿袭，如汉魏洛阳太极殿等。刘敦桢先生根据东西堂对东西厢的功能承接关系，做出一个重要推断：“自曹魏迄陈，以太极殿为大朝，东、西堂为常朝、日朝，疑由汉之东、西厢演变而成。”^{[1]457} 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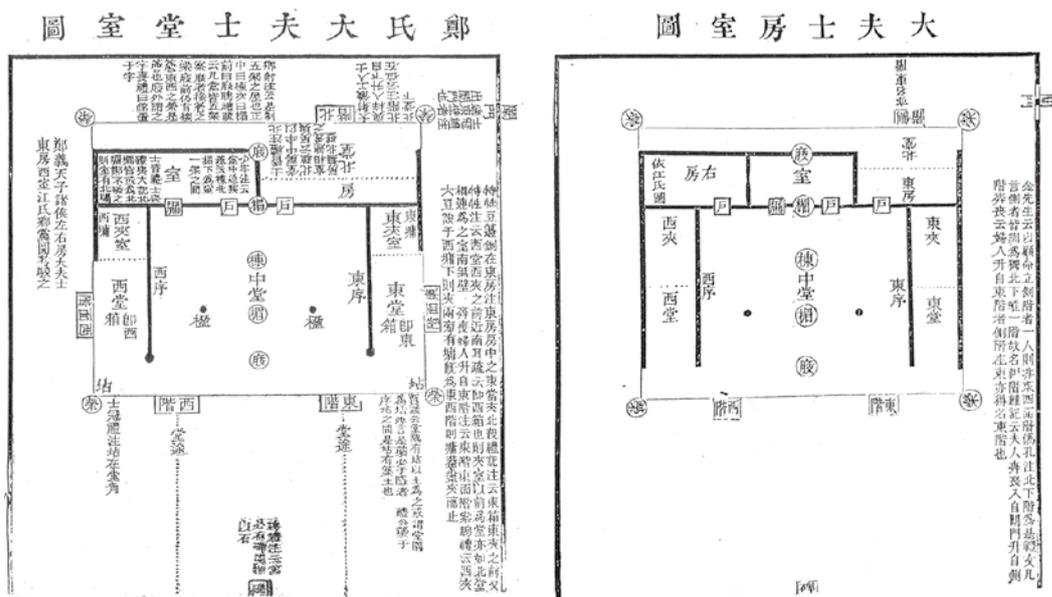


图 1 郑氏与江氏复原的周制大夫士堂室图局部
(图片来源:张惠言·仪礼图[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① 此书及现行教材中的“大夫士住宅图”摘录自《张惠言仪礼图》六卷，为同治九年崇文书局刻本，虽标注有“右房”但与室之间无分隔，可能反映了清代编撰者对此问题的异议。本文所用的是《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嘉庆十年刻本《张惠言仪礼图》，早于同治九年的版本，且是张惠言去世后不久刊行的，图文相合，应符合张氏原意。而郑玄的复原提示后汉时期大夫士的住宅可能有不少东房西室的情况。

推断虽一时难以确证,但极富逻辑性和说服力。关于此文的深刻内涵,《从“东西厢”到“东西堂”》^[4]一文已有详细解说,在此不再赘述。

2 堂室格局研究的重要意义

上述研究完稿于20世纪30至40年代,在刘敦桢的学术生涯中属于前期作品,但就其典范性和启发性而言至今仍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辉。以笔者浅见,其学术意义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指出了周制“前堂后室”格局的深远影响并提示后续研究。此格局作为一种“经典范式”为仪礼行为提供了空间支持,由先秦至两汉延绵不绝,直至清代仍有余韵。《大壮室笔记》所论述的早期宫室制度的延续性问题,是隐含在建筑史中的一条内在线索,对深刻理解礼制影响下传统建筑格局的演化有重要意义。而“前堂后室”制度在汉代以后演变与衰退的具体过程如何、是否有废止的明确记载等问题至今尚未明了。

2) 启发了从建筑单体内部着眼的研究视角。传统建筑空间研究一般注重以院落为核心的群体组织关系,这一视点固然重要,但若仅局限于外部形态如四合院、三合院、“L形”等难免有落入窠臼之虞。内部空间与礼仪行为的关系往往更为密切,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维持传统礼制的要求与不同时代新的空间需要之间的矛盾,作为一种内驱力持续推动着空间的进化,并呈现为建筑形态的阶段性演变。“内因往往起决定作用”,如同刘敦桢先生的东西堂研究所示,从这种视角出发有望对某些时期的特殊现象做出解释,从而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3) 提示了以史书尤其是历代礼书为依据进行空间复原的方法。如《大壮室笔记》所指出的,历代经学家为厘清

礼仪场景,依据“三礼”等典籍对建筑空间进行了详细考证。“宫室之学”这一学问由汉唐至明清延绵不绝,也可以称为古代知识阶层的建筑考古学。与史书只鳞片爪的记载相比,礼书对行为与空间方位的描述更为详尽,根据所行用的礼仪,可以反推当时的建筑空间格局。古代学者集中于考证周制,而今人以同样思路可以梳理历代宫室制度,此方面尚有大量领域有待探索。进一步而言,这类研究虽属建筑学范畴,某种意义上也承接了古代礼学与经学的深远文脉。

3 近期探索

堂室格局的演变研究虽意义重大,但在刘敦桢先生之后似乎未见明显进展。考古领域虽也屡屡提及早期宫室制度,然而受制于文献考据不足等因素,对其认识常有模糊之处。尤其汉代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久、所谓“蛮夷猾夏”最严重的阶段^[5],政权更迭频繁,宫室建筑方面既无地上实物留存,史籍也多有散佚,给后续研究造成了较大困难。所幸近年来相关遗址发掘和考古成果不断得以披露,为这一时期的宫室格局研究提供了可资印证的资料。

3.1 汉魏故城太极殿及北部院落遗址

汉魏洛阳故城的太极殿位于宫城中轴线上,自三国曹魏、西晋至北魏一直作为正殿使用。1984年考古界对宫城进行了试发掘,明确了太极殿的位置。2011年以来展开了太极殿遗址的全面勘察,确认了太极殿始建于曹魏时期(早期),北魏时期(中期)重修沿用,直至北周(晚期)仍有改建但未能完工(图2)。

根据发掘报告^[6],太极殿和太极东堂、太极西堂位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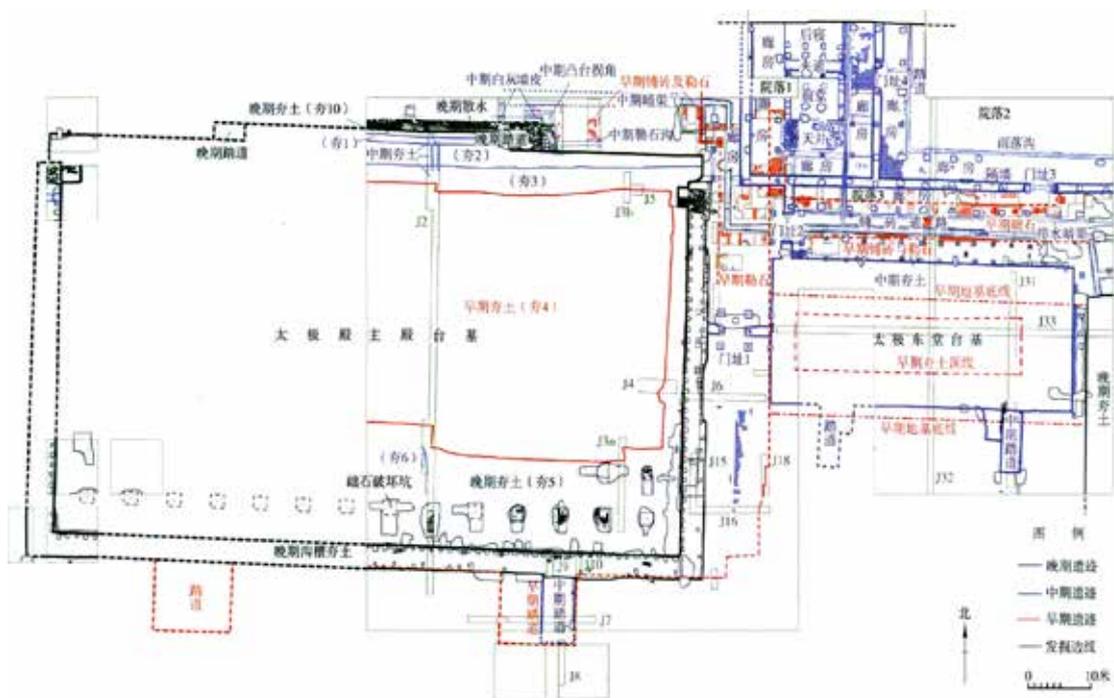


图2 汉魏洛阳故城太极殿遗址平面局部(图片来源:刘涛,钱国祥,郭晓涛.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J].考古,2016(07):67-68.)

大型宫院北部正中，宫院东西宽320米，南北长380米，三座建筑的東西方向轴线（屋脊线）基本对直。从主要发掘披露的东半部来看，太极殿主殿台基东西面阔约100米，南北深约60米，台基残高1.65~2米；太极东堂的台基东西约48米，南北进深约22米，残高约1.2米。两座建筑遗址及北面院落有以下特点引人瞩目。

1) 太极主殿和东堂内部已无墙体遗迹，但二者都有东西踏道（东西阶），且早期尺度特别宽大。三国曹魏时期太极殿的踏道南北残长10.5米，东西宽12米，至北魏时期踏道的宽度减小至一半左右，约5.3米。北魏时期东堂的踏道南北长约12米，东西宽约3.5米，两侧砌有包砖。类似的東西踏道做法一直延续至唐宋时期，如唐代大明宫含元殿、麟德殿遗址以及宋代河南济渎庙渊德殿遗址等。

《六朝时期的东西堂》推测东西堂与东西厢之间存在延续关系，但未言及正殿内部格局是否发生变化。《魏书》中提及当时重修沿用的太极殿——大臣崔光曾上书答复太极殿“西序”^①生长期类的吉凶之兆：

二年（北魏正始二年，公元505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极之西序，敕以示臣，臣按其形，即庄子所谓“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终晦朔”，雍门周所称“磨萧斧而伐朝菌”^②……

结合遗址情况看，太极殿外有左右阶，内部有东西序，因此沿用“前堂后室”格局的可能性很大。按古制，序的位置一般在两阶外侧，使人登阶后立于堂上。从太极殿两阶的位置推断，两序距东西山墙已不远，也就是说东西厢的空间尺度已难以容纳日常的朝见、宴饮活动，如刘敦桢先生所考证，此类功能已转移到东西堂。

2) 主殿与东西堂的距离相当接近。史料并未记载太极殿主殿和东西堂之间的距离，从北魏时期遗迹来看主殿与东堂台基之间距离只有14米，与西堂距离也约略相当。按建筑屋檐翼角一般超出台基考虑，二者屋顶的侧面距离可能更为靠近。此处宫院总宽度320米，则东西堂与两侧宫墙或廊道的距离尚有40米左右。因距离较近，主殿与东堂之间未设置廊道，而且曹魏时期二者的台基是直接相连的。结合刘敦桢先生的推断，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东西厢向东西堂过渡的初期状态。

3) 北部小院中的前堂与后寝。太极东堂北面偏西位置有北魏时期的小型院落一处，南北残长21.5米，东西宽约20米，院内东、南、西三面均有回廊，北侧遗迹已遭破坏。南面天井东西宽10米，进深4.6米，北面居中的正房分前堂与后寝，均面阔三间，宽9.3米，前堂进深

7.2米。从其尺度与位置判断，此小院很可能是用于临时休憩。特殊之处在于前堂与后寝之间有一夹道，宽度仅2米左右。此夹道与室内有高差，应为室外空间，功能上可以为后寝提供一定的通风采光。前堂与后寝的这种接近，同样可以解读为早期“前堂后室”向堂室分离过渡的中间状态。

另外，《三国志》及《资治通鉴》等记载，高贵乡公曹髦（241—260）“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③。太极殿是否采用了前后殿的形式，目前还难以判定。但前后殿格局在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宫殿遗址中得以确认。

3.2 北魏平城宫殿的组合模式

北魏天兴元年（398）道武帝拓跋珪在秦汉平城的原址上营建宫室，随后3年里依次建成了天文殿、天华殿、中天殿以及云母堂、金华室等西宫的主要建筑。对于西宫的布局沿革，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如下^{④⑤⑥}：宫殿的配列次序是天文殿在南，中天殿居中，天华殿在北，云母堂和金华室分别位于中天殿的东西两侧。据《南齐书》的记载：“（道武帝）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⑦，则中天殿及其东西配殿为日常起居使用的宫殿；天安殿为道武帝后期出现的名称，未有创建记载，可能是中天殿改称而来。

《魏书》记载：“太祖天赐六年四月，震天安殿东序。帝恶之，令左校以冲车攻殿东西两序屋，毁之。”^⑧此处明确记载天安殿有东西序，序屋应为原来东西厢的位置。冲车为攻城器械，可见其序并非轻质屏风而是夯土墙或砖墙。又据《魏书》以及《资治通鉴》记载，拓跋珪是因次子拓跋绍夜间接入天安殿行刺而死，可见天安殿内有皇帝的居室。^⑨因此天安殿虽然有东西配殿，但主殿内部应当是维持了“前堂后室”的传统格局。

孝文帝（471—499年在位）迁都洛阳之前在平城营建了大量宫殿与苑囿，并命令将作大匠蒋少游参照了当时的洛阳宫殿遗址。据《魏书》，“后于平城将营太庙、太极殿，遣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⑩太和十六年（492）建成太极殿建筑群，《水经注》记载：“太和十六年，破太华、安昌诸殿，造太极殿、东西堂及朝堂。……东堂东接太和殿。”^⑪

通过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太极殿东面的太和殿位置已基本辨明。2003至2008年，山西省和大同市的考古部门在大同操场城勘探了3处北魏遗址，即操场城一号、二号和三号遗址^{⑫⑬⑭}。一号遗址为一夯土台，东西长44.4

① 考古领域有时把魏晋宫殿中的“序”作为独立建筑加以论述，应与事实不符。“序”作为独立建筑见于先秦时期，起初作为教授贵族子弟射艺的场所，后来拓展为教育及养老等用途。《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礼记·王制》：“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作为学校名称的“序”在秦汉以后已未见沿用，而代以“庠序”之称。汉代辞书《尔雅》云：“东西厢谓之序”，另据《宫殿疏》，“长乐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序中三十丈”（见《大壮室笔记》），可见仍指堂两侧序墙。魏晋时期建筑中的序也应指序墙或序外侧的东西厢空间。

② 参见魏收《魏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五十五。

③ 参见陈寿《三国志》卷四，魏书四，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六，魏纪八。

④ 参见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六，列传第三十七，“倖臣”。

⑤ 参见魏收《魏书》卷一百一十二上，志第十七。

⑥ 参见魏收《魏书》卷十六，列传第四，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晋纪三十七。

⑦ 参见魏收《魏书》卷九十一，列传艺术第七十九。

⑧ 参见酈道元《明钞本水经注》卷十三，“瀑水”。

米，南北宽 31.5 米；二号遗址在一号遗址东北，二者相距 150 米；三号遗址在一号遗址以北，规模与一号相当，二者前后相距仅 10 米。据殷宪、朱庭枢等多位学者考证^[17-18]，一号应为太和殿前殿遗址，三号为太和殿后殿遗址，二号为太官粮储遗址。一号遗址南面有左右阶，北面与三号遗址之间以踏道相连接，证明太和殿是典型的前、后殿格局。紧邻一号遗址西侧也发现同一时期的大型夯土台基^[19]，受制于现状条件，一号遗址周边未能进一步发掘。段智钧等论证了太和殿的前身为中天殿组群^[20]，如此则存在“中天殿→天安殿→太和殿”的渊源关系。太和殿是否也有东西配殿，还有待考证。

考古发掘披露的这种前后殿形式过去虽较少论及，但应该并非孤例。《魏书》多次提到北魏平城的重大仪式在“前殿”举行，如文成帝“即皇帝位于永安前殿”^[71]，孝文帝“即皇帝位于太华前殿”^[72]。其中永安殿也有寝殿功能，如正平元年（451）三月，太武帝“崩于永安宫”^[73]；承明元年（476），献文帝拓跋弘“崩于永安殿”^[74]，疑被文明太后赐死^[21]。从《魏书》的记载可推知永安殿建筑群的功能区分。文成帝即位后，给事中郭善明劝其大起宫室，重臣高允（390—487）谏曰：“今建国已久，宫室已备。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75]可见永安殿的前殿是举行大典之所，其东西堂用于日常处理朝政，则永安殿的后殿应为寝殿。

这种“四殿一组”的组合模式是北魏平城内较为特殊的现象。从其空间与功能分化情况，结合刘敦桢先生的考证，推测这种模式可能是由汉代“前堂后室”格局分化而来。即东西厢向左右分离变为东西堂，居住部分的室和房向后分离变为后殿，前殿（主殿）与后殿之间有踏道直接相连（图 3）。分化后各单体建筑所承担的功能更为清晰明确，避免了相互干扰，扩大了日常使用空间的尺度，是对“前堂后室”古制的优化。但这种空间分化并非简单的拆解，从左右阶遗迹以及东西序等相关记载来看，至少前殿内部仍然维持了传统格局。

从史书记载中也可窥见南北朝时期其他宫殿的状况。

《隋书》记载了北齐（后齐）皇太子在崇正殿举行冠礼的流程，大致如下：“皇太子空顶赭公服出，立东阶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阶之南，东面……太子兴，入室更衣……太子又入室更衣。”另外也记载了北齐皇帝婚礼中，在昭阳殿行“同牢”（新婚夫妇共食）之礼：“主人公服，迎拜于门。使者入，升自宾阶，东面。主人升自阼阶，西面。”^[22]这些记载至少说明两阶制在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仪礼》规定冠礼时更衣是在东房、婚礼同牢是在室内，而北齐已改为冠礼更衣在室中、同牢在堂上进行。

另外《晋书》中提到了西晋惠帝在皇家学馆“上庠”中为皇太子举行先师礼：“三年春闰月，将有事于上庠，释奠于先师礼也。……敬乃扫坛为殿，悬幕为宫，夫子位于西序，颜回侍于北墉，……设樽篚于两楹之间，陈盥洗于阼阶之左。”^[23]为了行礼需要，临时将庠的内部用帷幕隔成古制宫室之状，按“东向为尊”摆放夫子的塑像。从这一记载来看，当时的皇家学馆已不再采用《仪礼》所示的堂堂格局。

“四殿一组”的布局模式在其后的都城宫殿格局中可能也有延续^[24-25]，但配殿位置有所变化（图 4）。根据傅熹年及张铁宁的研究，唐代渤海国上京城龙泉府宫殿建筑大体模仿唐长安大明宫，其中第三与第四宫殿前后相距仅 23 米，以柱廊连接形成一组工字殿，第四宫殿两侧分别建有东、西两配殿；功能上第三宫殿对应大明宫的紫宸殿，第四宫殿各居室内设火炕作为皇帝的寝殿，形成“前堂后寝”的格局。同样的模式在元大都隆福宫也有呈现，根据姜东成的研究^[26]，隆福宫光天殿正殿与寝殿前后排列，寝殿东西两侧分列皇帝用于读书或接见近臣的暖殿——寿昌殿与嘉禧殿。与魏晋时期不同的是，上述布局中的东西配殿布置在后殿（寝殿）而不是前殿的两侧。

3.3 晋代士大夫祭礼所反映的堂室格局

早期宫室制度主要在宫殿及大型宅第中得以延续，汉代庶民阶层中多见的“一堂二内”格式，如《大壮室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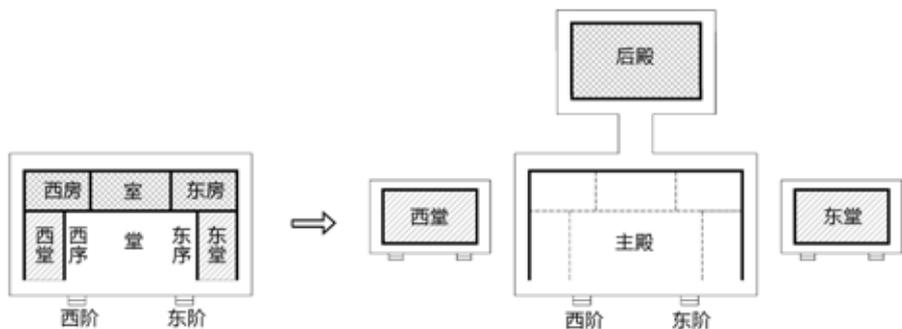


图 3 “前堂后室”空间分化示意图
(作者自绘)

- ① 参见魏收《魏书》卷五，帝纪第五。
- ② 参见魏收《魏书》卷七上，帝纪第七上。
- ③ 参见魏收《魏书》卷四下，帝纪第四下。
- ④ 参见魏收《魏书》卷六，帝纪第六。
- ⑤ 参见魏收《魏书》卷四十八，列传第三十六。
- ⑥ 参见魏徵《隋书》卷九，志第四。
- ⑦ 参见房玄龄《晋书》卷五十五，列传第二十五。

细描述了士大夫在祖庙行祭的整个过程和具体步骤,涉及祭祀器具陈设与主人、宾客、祝、尸等人的礼仪^[30],其中提到:“设洗于阼阶东南”,“夙兴,主人服如初,立于门外东方,……主妇视饔饔于西堂下”,以及“宾三献”等环节,与贺循祭礼对洗具、祭品的方位以及人物行为描述颇为一致。但是《仪礼》的士祭礼提及了祭祀流程中一位重要角色——“尸”,“尸”是指请活人扮演逝去的先祖,例如在祭祀之前,需“祝迎尸于门外”“主人洗角,升酌,醑尸”“主妇洗爵于房,酌,亚献尸。”而贺循祭礼中已无“尸”相关的流程,涉及的建筑空间也仅有堂、室、房等,与《仪礼》相比有所精简。

《通典》也描绘了晋代王堪^②子孙的冠礼,明确表述了对古礼的简化,但其中仍可见东西阶、东西厢的存在:

永平元年惠帝时,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孙立于步广里舍之阼阶,设一席于东厢,引冠者以长幼次于席南,东上。宾宗人立于西厢,东面,南上。堪立于东轩,西南面,西上。陈元服于席,上宗人执仪以次呼冠者,……事讫,上堂向御史府君再拜,讫。冠者皆东面坐,如常燕礼时。……此皆古礼也,但以意斟酌,从其简者耳。^[28]^③

南朝刘宋崔凯撰有《丧服节》:“卿大夫为夏屋,隔半以北为正室,中半以南为堂。正室,斋室也。”^[29]^④这是对南北朝时期“前堂后室”格局最直接的论述。此处所谓“夏屋”,当指《周礼·考工记》所述“夏后氏世室”^[31]^⑤,可说是古代宫室制度的最初蓝本。

根据以上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层的住居多以“厅事”为主要礼仪空间,厅事内部大致延续了古制“前堂后室”格局,但可能有所简化,更为详细的空间状况目前还难以判定。

参考文献

- [1] 刘敦桢. 刘敦桢文集: 第一卷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
- [2] 陈绪波. 《仪礼》宫室考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 [3] 刘敦桢. 中国古代建筑史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 [4] 焦洋. 从“东西厢”到“东西堂” [J]. 兰州理工大学学报, 37 (2011年中国建筑史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124-129.
- [5] 陈戌国. 中国礼制史: 魏晋南北朝卷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 [6] 刘涛, 钱国祥, 郭晓涛. 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 [J]. 考古, 2016 (07): 63-78.
- [7] 魏收. 魏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8] 陈寿. 三国志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9] 司马光. 资治通鉴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0] 曹臣明, 乔丽萍. 北魏道武帝至明元帝前期平城布局初步探讨 [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30 (6): 42-45.
- [11] 马斌, 胡苏平. 三晋史话: 大同卷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
- [12] 廉慧斌. 大同历史文化 [M]. 太原: 三晋出版社, 2015.
- [13] 萧子显. 南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14] 酈道元. 明钞本水经注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 [15] 张庆捷, 王银田, 曹臣明, 等. 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发掘报告 [J]. 考古学报, 2005 (4): 485-513, 525-533.
- [16] 张庆捷, 吕金才, 冀保金, 等. 山西大同操场城北魏二号遗址发掘简报 [J].

4 结语

刘敦桢先生《大壮室笔记》等系列研究,不仅指出了早期宫室制度在汉代的延续发展,也启发了“由内而外”进行建筑形态演变研究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刘敦桢先生已阐明汉代的宫室建筑延续了“前堂后室”的古制,并推测六朝时期流行的东西堂是由“东西厢”演化而来。本文结合近期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考证,尝试作如下推断:汉魏洛阳故城太极殿遗址中,主殿与东堂的距离、北朝小院前堂与后寝的距离都非常接近,可以解读为“前堂后室”空间开始分离的早期状态。北魏平城主要宫殿中“前后殿、东西堂”的典型模式,可能源于“前堂后室”空间与功能的进一步分化。前殿用于大型典礼,东西堂用于日常政务活动,而后殿用作正寝,前后殿之间以踏道直接相连。推测前殿(主殿)内部仍有堂、室及东西序(东西厢),基本维持了古制。类似这种“四殿一组”的格局在唐代上京城龙泉府及元大都隆福宫也可见到。另外从《通典》等史书记载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的重要礼仪活动多在住宅的厅事举行,厅事也大体维持“前堂后室”的古制,可能局部有所简化。

正如刘敦桢先生指出的那样,早期宫室制度影响深远,至清代仍有遗韵。历代统治者出于宣扬权力合法性的需要,力图在核心政治空间中体现“周制”;而士大夫阶层对儒家礼制本身的恪守,也使古制格局维持着文化层面的正统地位。这种观念上的保守性与时代发展对空间提出的新需求之间的矛盾,作为一种内驱力推动着传统建筑发生缓慢而连续的演化。建筑史上出现的一些特殊格局,也可能与堂室空间演变的阶段性状态有关。这类延伸议题有待今后做进一步探讨。

文物, 2016 (4): 1, 4-25.

- [17] 殷宪. 北魏平城考述 [M]//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北朝研究: 第七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50-83.
- [18] 朱庭枢. 北魏建筑特征研究 [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3.
- [19] 王银田. 试论大同操场城北魏建筑遗址的性质 [J]. 考古, 2008 (2): 69.
- [20] 段智钧, 赵娜冬, 吕贞学. 北魏孝文帝时期平城宫殿建设的考证 [J]. 文物世界, 2011 (3): 9-14.
- [21] 李海. 北魏平城中的宫城布局研究 [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 29 (3): 40.
- [22] 魏徵. 隋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23] 房玄龄. 晋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 [24] 傅熹年. 中国古代建筑史: 第二卷 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556.
- [25] 张铁牛. 渤海上京龙泉府宫殿建筑复原 [J]. 文物, 1994 (6): 40.
- [26] 姜东成. 元大都城市形态与建筑群基址规模研究 [D]. 北京: 清华大学, 2007: 64.
- [27] 郑玄. 礼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28] 杜佑. 通典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 [29] 李昉. 太平御览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30] 郑玄. 仪礼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31] 郑玄. 周礼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17.

① 参见郑玄《仪礼》卷第四十五。

② 王堪为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1)车骑将军。

③ 参见杜佑《通典》卷五十六, 礼十六嘉礼一, “诸侯大夫士冠”。

④ 参见李昉《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一, 居处部九, “屋”。

⑤ 《周礼·考工记》:“夏后氏世室, 堂修二七, 广四修一。五室……四旁两夹……堂三之二, 室三之一。”参见郑玄《周礼》。